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4 冊

清代《論語》述何學考

賴 溫 如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論語》述何學考／賴溫如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14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編：第 14 冊）

ISBN：978-986-6831-23-2（全套精裝）

ISBN：978-986-6831-07-2（精裝）

1. 論語－研究與考訂 2. 經學－中國－清（1644-1912）

121.227

96004370

ISBN - 9866831072



9 789866 83107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6831-07-2

清代《論語》述何學考

作 者 賴溫如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論語》述何學考

賴溫如 著

作者簡介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中興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以研究清代學術思想為主，著有：《晚清新舊學派思想之論爭——以翼教叢編為中心的討論》專書及〈嵇康與反玄學思想〉、〈魏晉反玄學思想對貴無思想的批判〉、〈《明夷待訪錄》之經世思想述評〉、〈皮錫瑞《春秋通論》析論〉、〈論孫盛「以儒統老」之思想〉、〈論章學誠《易教》篇的六經觀念與《易》學思想〉。另有〈李清照《詞論》析探〉、〈「紅」與「綠」在《小山詞》中的作用〉、〈晁補之與李清照詞學觀點之分析——從評論各家詞作談起〉、〈音節修辭法在詩文教學上的運用〉等專題論文。

提 要

《論語》為儒家重要的典籍之一，自先秦以來，歷代投注於其間作研究的學者，不可勝數。因之，在清代繁盛的經學風潮下，亦有眾多學者從事《論語》的研究工作，有匡正古注者；有紹明絕學者；有自立新說者……，著述豐富，瀚如煙海。

本論文乃欲探求清代今文經學復興後，群經大義走向《公羊》化，清代學者劉逢祿、宋翔鳳、戴望、劉恭冕、俞樾、康有為等人亦援引何劭公之義以說解《論語》，故有《論語》述何之作。本論文即欲探討上述諸位學者的《論語》著作所展現的學術風貌，及其於經學史上的意義。

本論文研究的重點，在於考察劉逢祿《論語述何》、宋翔鳳《論語說義》、戴望《論語注》、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俞樾《何劭公論語義》以及康有為《論語注》所承繼或發明的漢代《公羊》思想，以及著作中非關《公羊》義之處，並使其理論化。

本論文之作，共分為九章：

第一章先述研究動機、重點，並闡明全文之研究範圍及各章節之旨趣。第二章探討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時代外因與學術本身發展的內在因素，而《公羊》學說由西漢董仲舒發萌，經東漢何休總結義例，及於清代援《公羊》思想以經世致用，以見《公羊》學說的歷史沿革。第三章探究劉逢祿之生平與其治《春秋》學之觀念，劉氏《論語述何》乃為追述何氏之意而作，故援引《公羊》三科九旨、正名之義以釋《論語》者，並以今文學之觀點詮釋關於「學」的種種觀念。第四章除陳述宋翔鳳生平事蹟及治學方式，並分析《論語說義》的考據特色，以及《論語說義》所呈現關於《公羊》素王與三統、三世之思想，亦論及非涉《公羊》義例的政治思想。另者，宋氏援引《易》、《老》思想以說解《論語》，顯示其欲會通《論語》於《易》、《老》之用意。第五章首先論述戴望之生平與其治學歷程的轉變，而其《論語注》的體例較之劉逢祿《論語述何》、宋翔鳳《論語說義》顯得完備。戴氏《論語注》中所呈現的三科九旨思想，以及經權思想亦是引《公羊》義例以說《論語》。

第六章探究劉恭冕之生平與治學歷程，以及《何休注訓論語述》的著作動機，再由其所附之案語，分為「闡明何氏之意者」與「異於何氏之意而別有一解者」兩方面，以瞭解其護衛或匡正何休《公羊》義之處。第七章先論述俞樾生平與其諸多著作，其《何劭公論語義》乃為恢復何休《論語注》而作，由其所附之按語，足以見其闡發何氏之義旨。第八章康有為的一生，可謂之起伏多變，其為《論語》作注，乃欲以今文學之觀點企圖重新詮釋《論語》，三世進化說為康氏的重要思想之一，而關於「學」的諸多觀念，可謂為一家之論，康氏對儒家重要德目「仁」與「禮」亦有所承繼及發揮。第九章首先回溯於何休曾否注訓《論語》之相關問題，作分析探討，並檢討諸《論語》述何之作的得失。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重點及範圍	2
第二章 清代今文經學之復興及公羊學說	5
第一節 清代今文經學復興之探討	5
壹、時代環境之影響	7
貳、學術內在之發展因素	9
第二節 公羊學之歷史沿革及其特色	14
壹、《春秋》經傳與公羊學	14
貳、西漢之公羊學	15
參、東漢之公羊學	18
肆、清代之公羊學	21
第三章 劉逢祿《論語述何》研究	25
第一節 劉逢祿及其《論語述何》著作動機	25
壹、生平略傳	25
貳、《論語述何》之著作動機	28
第二節 《論語述何》以《公羊》之義闡發《論語》	29
壹、以「通三統」義闡發《論語》	29
貳、以「文質相代」義闡發《論語》	31
參、以「張三世」義闡發《論語》	33
肆、以「異內外」義闡發《論語》	35
第三節 《論語述何》以《春秋》正名思想註解《論語》	37
第四節 《論語述何》中「學」之觀念	41
壹、「學」爲刪定六經	41

貳、「學」當先正聲音文字	42
參、「學」以善其行	43
第四章 宋翔鳳《論語說義》研究	45
第一節 宋翔鳳及其《論語說義》著作動機	45
壹、生平略傳	45
貳、《論語說義》之著作動機	46
第二節 《論語說義》之考證特色	47
壹、考證文字繁多	47
貳、辨正歷來注家之誤	48
第三節 《論語說義》之素王思想與今古文之論	51
壹、素王思想	51
貳、今古文之觀念	52
第四節 《論語說義》之通三統及張三世思想	53
壹、通三統思想	54
貳、文質觀	54
參、張三世思想	57
第五節 《論語說義》之政治思想	58
壹、崇尚以禮治國	58
貳、立教興學以化民	60
參、舉賢才而用之	61
第六節 《論語說義》引《易》、《老》研究	61
壹、援引《易經》思想以說《論語》	61
貳、援引《老子》思想以說《論語》	63
參、會通《易經》、《老子》與《論語》之思想	65
第五章 戴望《論語注》研究	69
第一節 戴望及其《論語注》著作動機	69
壹、生平略傳	69
貳、戴望《論語注》之著作動機	71
第二節 戴望《論語注》之異文及引文	74
壹、異文之出現	74
貳、引文多未標明出處	75
第三節 戴望《論語注》之三科九旨思想	77
壹、通三統思想	77
貳、文質觀	78
參、張三世之思想	81
肆、異內外之思想	83
第四節 戴望《論語注》之經權思想	85

壹、權反經而合道	85
貳、譎以行權正以守經	87
參、經權並濟	87
第六章 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研究	91
第一節 生平略傳	91
第二節 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析評	92
壹、闡明何休之意者	92
貳、異於何休之意而別有一解者	100
第七章 俞樾《何劭公論語義》研究	105
第一節 俞樾及其《何劭公論語義》著作動機	105
壹、生平略傳	105
貳、《何劭公論語義》之著作動機	106
第二節 《何劭公論語義》析論	107
第八章 康有為《論語注》研究	113
第一節 康有為及其《論語注》著作動機	113
壹、生平略傳	113
貳、康有為《論語注》之著作動機	115
第二節 康有為《論語注》之三世進化說	119
壹、三世進化說之淵源	119
貳、三世進化說之理論基礎	120
參、政治與經濟之三世進化	121
肆、三世進化先小康後大同	122
第三節 康有為《論語注》中「學」之觀念	124
壹、「學」為人與物之別	124
貳、「學」為聖與常之別	125
參、「學」當與時遞進	126
第四節 康有為《論語注》中「仁」與「禮」之觀念	127
壹、康有為《論語注》對「仁」之觀念	127
貳、康有為《論語注》對「禮」之觀念	131
第九章 結 論	135
第一節 清代《論語》述何學之檢討	135
第二節 清代《論語》述何學之影響與貢獻	138
參考書目	14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趙岐《孟子題解》云：「《論語》者，五經之鎬鑰，六藝之喉衿也。」此言無非揭示了《論語》於群經中的崇高地位，《論語》於《易》、《書》雖未明顯提及，於《春秋》更少論及，然觀《論語》之內容，又無所不涉及諸經之精義，因之，我國文化雖以儒家經典為主脈，而儒家典籍，則以《論語》為入門之鑰。

《論語》雖早於春秋時期即已成書，然學術的興衰往往為政治型態所影響，戰國時期，諸侯為圖霸業，競尚縱橫之說，故《論語》未能盛行於時，至秦代燔百家之書，群經皆遭浩劫，幾至焚毀。迄至漢興，除廣開獻書之風外，而斷簡殘篇，不能成書者，幸有先儒憑記憶口授，講學於齊、魯之間，始有《齊論》、《魯論》之傳承，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論》，此為《論語》三大流別，故自兩漢以降，歷代學者有關《論語》之著述，可謂浩如煙海。

再者，由經學史觀之，漢武帝獨尊儒術，使經學昌明於兩漢，然隨世代之更迭，魏晉政局的動盪分裂，使經學難以玄言並呈現分立狀態，至隋唐政治一統，經學亦由分立而趨於一統；宋明時期，談心性之理學盛，傳統經學隱沈，迄有清一代，亦因政治因素，經學得以復盛。清代學者投入經學之研究，遍歷群經，有鑽研文字聲訓者，有闡發義理者，有自立學說者，實蔚為清代經學之大流。因之，在清代繁盛的經學風潮中，亦有眾多學者置身於《論語》的研究工作，有蒐采異義以匡正古注者；有脩集異說以昭明經學者；有自立一說以別出新解者；有專事考證訓詁以探索原委者；有收輯佚文以恢復原貌者，……著述林總豐碩各有立意，乃為可貴的文化資產。

面對如此豐盈的學術成果，除了感懷先儒們以經傳的傳承作為安身立命的理想外，亦願一窺清代《論語》學之堂奧，然衡諸自身之精力及興趣等因素，欲於清儒諸多《論語》著述中，僅取紹明漢儒何休之說者，作為初步研究的領域，究析動機厥有三端：

一者，清代中葉以後，知識份子面對道、咸以降的衰弱國勢，以及對乾嘉考據學的繁瑣破碎有所反省，進而於傳統經學中尋得《公羊》經傳思想，以其微言大義切合時代之需，故以之貫通群經之義，而將《公羊》視為群經之歸趣。首先由武進莊存與的《春秋正辭》，使今文經學由微而顯，然莊存與之學並不顯揚於當世，其學說端賴姪莊述祖、孫莊綬甲及其外孫劉逢祿、宋翔鳳的闡發始得以光大。其後龔自珍、魏源等從劉逢祿受《公羊》學，踵繼闡發，《公羊》學遂蔚為今文學的中心，並援之於政治，隨後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又據之擴展並鼓動風潮，形成晚清政治改革的壯闊波瀾，實為當日知識份子融經術、政治為一體之展現。因之，將此類學者的思想風格，置於當日時代及學術背景下，實有值得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二者，因何休為東漢今文學家，《後漢書·儒林傳》曾謂：「何休注訓《論語》。」然其書早已不傳，僅存留《公羊解詁》一書。清代儒者崇尚漢學，往往於漢代經師之說，皆欲求其拾遺補闕；發其幽光，於是有牽引何氏之說，推闡其義於《論語》者，冀以存何氏《論語注》之大凡。故清代學者劉逢祿《論語述何》、宋翔鳳《論語說義》、戴望《論語注》、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俞樾《何劭公論語義》、康有為《論語注》等，皆欲追述何氏之意，欲存微言大義之旨，乃秉何氏之說以解《論語》，其中雖不免牽附《公羊》義例之處，然亦為別出一格的詮釋方式，故本論文以「清代《論語》述何學考」為題，即欲分析此學派之《論語》著作，期盼於逐步探索過程中，能漸次揭開其《論語》學之特色，此乃為本論文撰述之重要宗旨。

三者，本論文雖擬以研究劉逢祿、宋翔鳳、戴望、劉恭冕、俞樾、康有為等人以何休《公羊》義解說《論語》者為全論文之重心，然由於每位學者的治學方式及思想觀念不盡相同，其《論語》著述中亦含有非關《公羊》學之處，皆各具特色，此亦為本論文所欲探求的目的之一。

第二節 研究重點及範圍

本論文研究重點，乃在於考察劉逢祿《論語述何》、宋翔鳳《論語說義》、戴望《論語注》、康有為《論語注》所承繼或發明的漢代《公羊》思想，並將其條理化。由於《公羊》義例內容極為豐富，後世學者常因時或因人的不同，而各有所偏重之

主題，所謂因時者，即指學者當時所受的時代環境及學術風潮之影響。所謂因人者，即指個人之身世、交游與志趣等。因之，本論文在處理上述人物的《論語》著作時，首先對於每位作者之生平經歷及治學態度、學術風格等均做一概略性的陳述，進而分析其《論語》著作的撰寫動機。其次以《公羊》「三科九旨」之說為主軸，分析各家《論語》著作所呈現的「通三統」或「張三世」或「異內外」之《公羊》思想，然由於每位學者的著作風貌、思考理路，不盡相同，故再擷取各家著述較為顯明的《公羊》特色，諸如：正名思想、經權思想、今古文之觀念……等，做為研究的著眼點。另者，對於每位學者《論語》著作中未含雜《公羊》說之處，亦提挈出來，旨在觀察諸位學者除《公羊》義外的其他學術思想，或寫作之特色。

至於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及俞樾《何劭公論語義》雖承劉氏、宋氏、戴氏以《公羊》傳注說《論語》之風氣而作，然由於著作內容短少，又大多刺取何氏《公羊解詁》中引《論語》者，乃為考述之作並不偏主以《公羊》義例作為思想的發揮，故筆者遂逐一採劉氏、俞氏之案語加以分析，以觀其推闡、考述何休《論語注》之處。

關於本論文擬以研究的六種《論語》著作，所依據之版本，說明如下：

一、劉逢祿《論語述何》兩卷，《皇清經解》本，卷一二九七～一二九八（台北：藝文印書館）

二、宋翔鳳《論語說義》十卷，《皇清經解續編》本，卷三八九～三九八（台北：藝文印書館）

三、戴望《論語注》二十卷，《南菁書院叢書》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四、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一卷，《皇清經解續編》本，卷一四一二（台北：藝文印書館）

五、俞樾《何劭公論語義》一卷，收錄於《曲園雜纂》卷七，春在堂全書本（台北：環球書局）。

六、康有為《論語注》二十卷，《無求備齋論語集成》本（台北：藝文印書館）

以上諸書皆為本文之研究主題，於撰寫中當必重覆引用，故僅標明卷數，頁數。

本論文之作，凡分為九章：

第一章「緒論」，先敘述研究動機，再述研究重點，次明全文之研究範圍及各章節之旨趣。

第二章「清代今文經學之復興及《公羊》學說」，略述清代今文經學復興之時代外因與學術本身發展之內在因素，其次探討《公羊》學說由西漢董氏發萌，經東漢

何氏總結義例，而及於清代援《公羊》思想以經世致用，以見《公羊》學說之歷史沿革。

第三章「劉逢祿《論語述何》研究」，本章首先言劉氏之生平與其治《春秋》學之觀念，並探究《論語述何》著作動機外，對於其所援引《公羊》三科九旨、《春秋》正名之義以釋《論語》者，均舉例分析以說明之，最後分析劉逢祿以今文學之觀點詮釋關於「學」的種種觀念。

第四章「宋翔鳳《論語說義》研究」，除陳述宋氏生平事蹟及其治學方式外，並分析《論語說義》之著作動機、考據特色，其次探討《論語說義》有關《公羊》的素王與三統、三世思想，亦論及非涉《公羊》義例之政治思想，末則對宋氏援引《易》、《老》思想以說《論語》的部份作分析，以明宋氏欲會通《論語》於《易》、《老》之用心。

第五章「戴望《論語注》研究」，首先論述戴氏之生平與其治學歷程的轉變，並分析其為《論語》作注之動機，其次推測戴氏《論語注》中出現與今本《論語》異文之原因，以及對注中引文多未表明資料來源的情形作分析說明。又論《論語注》所呈現之三科九旨思想，末則言其經權思想之特色。

第六章「劉恭冕《何休注訓論語述》研究」，探究劉氏之生平與治學歷程，並試圖分析其《何休注訓論語述》之著作動機，再由其所附之案語，分為「闡明何氏之意者」與「異於何氏之意而別有一解者」兩方面，以探討其著作之旨。

第七章「俞樾《何劭公論語義》研究」，先論述俞氏之生平與其諸多著作，次由《何劭公論語義·序》瞭解其著作動機，再分析所附之按語，以見其闡發何氏之義旨。

第八章「康有為《論語注》研究」，首先對於康氏一生的活動與其思想之轉變，做編年式之說明，並分析其《論語注》之著作動機。由於三世進化說為康氏的重要思想之一，故釐析出《論語注》中所含的三世進化思想，並使之理論化，次論康氏《論語注》關於「學」的諸多觀念，最後，分析身為儒家學者的康氏，對於儒家重要德目「仁」與「禮」所作的承繼及發揮。

第九章「結論」，首先對於何休曾否注訓《論語》之相關問題，作分析探討，次而檢討諸《論語》述何著作之得失。

本論文於撰寫期間，凡題目之擬定、章節之體例安排及文句之考核等各方面，均承簡博賢的悉心指導，在老師殷殷教誨與不斷鼓勵下，本論文始得以完成，在此僅致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然因筆者不敏，識見有限，論文中必多謬誤疏漏，尚祈諸先進予以匡正指導為感。

第二章 清代今文經學之復興及公羊學說

第一節 清代今文經學復興之探討

我國經學昌明於漢武帝，而極盛於西漢元、成二帝至東漢期間〔註 1〕，然由於文字差異及學派經說的不同，遂有各守門戶，壁壘分明的今古文經學之別。皮錫瑞《經學歷史》即言：

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劉歆創通古文，衛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說，以與今學分門角立矣。然今學守今學門戶，古學守古學門戶，今學以古學爲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爲黨同妒真，相攻若讎不相混合。

蓋古文經學將五經視爲歷史文獻，並重視文字之考證訓詁，故較能忠實於經書原意。今文經學則較重視時代性，好以經義附會時事，多講求經書微言大義。西漢之際，今文經學於學術上佔優勢，以十四博士爲主，力倡通經致用之說。至西漢末年，劉歆提倡古文經學，援引古訓貫通群經，加上衛、賈、馬、許等人之助力，於是古文經學亦別樹一格，迄至鄭玄融合今古文後，今文經學於是湮沈了一千餘年。直至入清後，經學所呈現之基本精神，即如梁任公所言「以復古爲解放」，至於從復古中得解放的演變歷程，其《清代學術概論》有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

〔註 1〕此處採皮錫瑞之說，以經學至漢武帝時期始昌明，而自漢元、成二帝到後漢則爲經學極盛期。參見皮氏《經學歷史》三、〈經學昌明時代〉頁 70 與四、〈經學極盛時代〉頁 101，台北：漢京出版社，1983 年 9 月初版。

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以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然在節節復古中，「非徒復前代之古而已，乃以前學之舊瓶，裝清學之新酒。」〔註2〕可知，清代經學雖言復古，實是從復古中自創新意。無怪乎梁任公形容清代學術是「倒影而縑演之，如剝春筍，愈剝愈進裡。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註3〕皮錫瑞《經學歷史》將清代經學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

國朝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少。說經皆主實証，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穀》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

由清初漢、宋兼采的相容學風，進而以漢學獨幟，最終而復於西漢今文經學的異軍突起，因此，沈寂一千餘年之今文經學就在復古與解放中，恢復了生命力，進而取代乾嘉之考據學，對道、咸以後的學術思想，造成了重大影響。此一轉變，歷來學者多以「復興」稱之，然對於復興之原因，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有言：「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漢今古文舊案，終必翻騰一番，勢則然矣。」然侯外廬並不認同此觀點，其以為：

舊案不必一定須沿著兩漢路線重覆地翻騰一番，而所以形式地翻騰者，主要在於清初的暴風雨暫被滿州文化政策所安定，道、咸之際，所來臨的更大的暴風雨，復驚醒了退避於訓詁以求安身立命的人們。思想在這史無前例的衝擊之下，自然要迫使著人類做出那種「非常異議可怪之論」的夢囈了。所謂三世、三統的微言大義，便可能成為外衣，輸入新的引申附會，表面上則採取今古文學的論爭方式。〔註4〕

事實上兩者之觀點僅持論角度相異而已，任公所言乃從學派本身發展之趨勢而論，因就學術思想發展的邏輯觀之，一個學派在亟於鼎盛時，與其相對之學派亦隨之興

〔註2〕語見李新霖《清代經今文學述》，頁14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1978年6月版。

〔註3〕引見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102，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7年十月台3版。

〔註4〕引見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下冊，頁586，出版地、出版年月不詳。

起發展，展現另一不同性格之學術風貌。因此，東漢之學的興盛，自然也就引動了西漢經學的復甦。然侯外廬則著眼於時代環境對學術發展之影響而論，見出清代學者在面對日益不同的政經變化時，所含藏的回應能力，因此藉著舊有的今古文論爭方式而賦予新的學術與政治意義。因此，本文擬將以時代環境為外因；以學術本身發展因素為內緣，做為探討清代今文經學所以復興的兩大面向。

壹、時代環境之影響

「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嚮。」〔註5〕可知，學術風氣之形成或轉變，往往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環境」所涵蓋之範圍雖廣，乃以政治關係最大〔註6〕。

因讀書人思想之出處，自是從其所處政治環境中萌芽，諸如：身遭亡國之痛的清初儒者，便致力於經世之學；清廷一連串的文字獄，則使學者為避諱時忌而轉向訓詁考據之學。因之，道、咸以降的今文經學，能蔚為學風亦不可忽略其時代之外燦力量。

一、內憂之頻繁

西元1796年，清仁宗繼承清高宗的皇位後，同時亦將一個動亂紛擾的局勢接移過來。因此，嘉慶時期可說是清帝國衰落之起點，在往後數十年間，除列強交相侵迫外，內亂也連續仆起，於內憂與外患夾擊下，不免走上了衰亡之途。自乾隆以後，除政治和軍隊之腐敗外，人口的急遽增加以及漢人的排滿意識都是內亂所以持續擴大之因。嘉慶時期的內亂，以苗人和白蓮教的叛亂為最烈，苗亂始於乾隆六十年（西元1795年），直至嘉慶十二年（西元1807年），始完全平息苗境。白蓮教徒之叛亂，起於嘉慶元年（西元1796年），清廷以鄉勇為主要戰鬥力，分途剿撫，教徒之勢力因而衰弱，至嘉慶九年（西元1804年）才完全肅清。清宣宗道光初年，西北又有回亂，天山南路的回民因受官吏壓榨，積忿難平，便於嘉慶末年屢次犯邊。清室遣楊遇春等率軍討伐，於道光八年（西元1828年）始將回部平定〔註7〕。

太平天國是清文宗時代，洪秀全在南方所建立的反清政權，持續十五年之久，戰禍遍及十八省，是清代規模最大最長的一次內亂。為繼白蓮教之後，另一次以宗教迷信為號召的抗清運動，道光三十年（西元1850年），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

〔註5〕語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台2版。

〔註6〕參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4，台北：華正書局，1979年5月版。

〔註7〕參考傅樂成《中國通史》下冊，頁675～678，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印行，1982年1月，新編排4版。

金田村，使清廷形勢一度告急，對此危殆的局勢，清廷除派兵進剿，並下詔獎勵各省舉辦團練，湘軍淮軍紛紛成立，加上「常勝軍」〔註8〕都是進剿太平天國的主力。太平天國亦因內部諸王爭權間隙日深，又無人才、無制度可言，且神權色彩濃厚，行為荒誕，甚至焚殺劫掠，漸遭民怨，終不免將太平天國推向衰弱的命運。因之，經過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藩等人的誅討，於穆宗同治四年（西元1865年）終歸滅亡〔註9〕。

此外，與太平天國舉兵相應的，還有華中的捻亂，捻匪所到之處，滿目瘡痍，西南、西北地區的回民亦先後叛變，直至光緒三年（1877年），才將亂事平定。經過長期的大小內戰之後，民生已逐漸凋蔽，社會元氣大傷，國力遂日漸衰弱。

二、外患之紛然

鴉片戰爭以前，清廷往往以天朝大邦自居，視外人猶如未開化之夷狄，而鴉片戰爭則開啓了中西方勢力的首度接觸。觀清廷之所以失敗，絕非一人一事之故，而實是由於清政府的懵懂無知，對內任用非人且軍械不精；對外則知識落伍且不明世局之轉變，以致戰守茫然毫無方略〔註10〕。戰後中英在南京達成和議，於道光二十二年（西元1842年）7月，定下了南京條約，包括：賠款、割讓香港、開五口通商、自由居住貿易等十三條款項。然對於鴉片的禁革問題，卻隻字未提。此不平等條約公佈後，歐美各國商人爭請訂約通商，加上清廷對國際事務的無知，於是不平等條約陸續出現。在中英南京條約成立後，廣東被列為通商口岸，廣東民眾排外甚劇，地方官員亦以頑強傲慢之態度，處理外交事務，因此屢與英人發生衝突，遂種下英法聯軍的暗因。

另外，法帝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亦有東進之意，又廣西西林縣發生殺害法國教士事件，遂於咸豐七年（西元1857年），與英國組織聯軍相繼東來。此次英法聯軍之役所簽訂的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係屬城下之盟，英法兩國利用清廷對國際形勢的不明，不知國權屬性的重要，而予取予求，更取得諸如：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內河航權……等，條條均是喪權辱國。

自鴉片戰爭後，俄國也積極向中國展開侵略，迫使清廷開放了海路與陸路通商，

〔註8〕「常勝軍」是由李鴻章與美籍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所率的「洋槍隊」合作組成。

〔註9〕對於太平天國的始末及其失敗的原因，可參考蕭一山《清代通史》冊（三），頁1～40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1月修訂本台4版。

〔註10〕關於鴉片戰爭我國失敗的原因，可參考蕭一山《清代通史》冊（二），頁987～100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1月修訂本台4版。

並喪失了東北近百萬公里的土地，使東北邊務危機日增。同治年間，日本亦開始肆行於東，對我國藩屬生覬覦之心，終於光緒二十年（西元 1894 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除了割地賠款外，也割讓了台灣、澎湖群島。列強的紛紛侵奪，使國人排外情緒日益升高，遂有義和團的興起，以「扶清滅洋」為號召，終於引發八國聯軍，招來更大的恥辱與損失，慈禧與光緒帝狼狽出走，自此民族自信大失，也無應戰能力，只有任人宰割了〔註 11〕。

綜上所述，由於內憂頻繁、外患紛然，使政治、經濟、社會遭到空前的變動，對學術自然造成重大影響。讀書人對於內外兵禍紛沓而來，反思所學於世何濟？而歸咎於學非所用，蓋因當時學者崇尚考證，徒事摭績補苴，流於鉅訂瑣碎，無俾於實際社會，無補於時艱。因此，就在考證之學而走入窮途末路後，轉換之機亦由此萌生。因自鴉片戰爭後，已觸發讀書人經世致用的治學觀念，而海禁的開放更使西學得以輸入，令學者探求新知之慾日熾；對清廷政治厭棄之情也日烈。清廷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下，不可逆轉地走向衰敗，對社會的控制力日喪，思想的禁錮遂漸解除，然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學者紛紛改弦易轍，以經世之學結合西學知識，造就了另一風格的新學風，遂使居正統派的乾、嘉之學宣告分裂，代之以恢復西漢之古的今文經學，而呈現出新的學術意義。

貳、學術內在之發展因素

學風的轉變除受之於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外，就學派形成的特點而言，每個學派固然有其思想的基本特色，卻也不排除對以往學術思想的繼承，甚至是利用過去學派思想的可能〔註 12〕。另方面，學術思想本身的內在檢討，也足以為學術注入變化的動力。因此，就清代經學的發展而論，對於清初經世思想的繼承以及對乾嘉之學的檢討，都是復興今文經學的重要因素。茲以清初致用之學的影響與對乾嘉考據之學的檢討兩方面，作為論述今文經學所以復興的依據。

一、遙承清初經世致用之經學觀念

梁任公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及清代學術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此外還有一個「排斥理論提倡實踐」之「支流」〔註 13〕。

〔註 11〕關於庚子事變，可參考蕭一山《清代通史》冊（四），頁 2155～225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1 月修訂本台 4 版。

〔註 12〕參考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心學〉，頁 52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 4 月版。

〔註 13〕同註 6，頁 1～2。